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monochromatic, sepia-toned illustration. It depicts a cave interior with several figures. In the foreground, there are two large, stylized faces or figures, possibly representing deities or guardians, with prominent features like large eyes and beards. Behind them, more figures are visible, some appearing to be in conversation or engaged in an activity. The background is filled with intricate, swirling patterns and foliage, suggesting a natural, cavernous setting. The overall style is reminisc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woodblock prints or ancient cave art.

榆林窟研究 论文集

下 册

敦煌研究院编

YULINKUYANJIULUNWENJI

上海辞书出版社

榆林窟研究 论文集

下 册

敦煌研究院编

YULINKUYANJIULUNWENJI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榆林窟研究论文集/敦煌研究院编.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9
ISBN 978—7—5326—3238—1

I. ①榆... II. ①敦... III. ①敦煌石窟—壁画—文集 IV. ①K879.4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7111 号

策划统筹 余 岚
责任编辑 王继红
装帧设计 姜 明 杨 阳

榆林窟研究论文集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61.625 插页 18 字数 1 459 000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3238—1/K·756

定价: 250.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66511611

瓜州东千佛洞第2窟供养人身份新探

张先堂

一 缘起与结论

在西夏统治瓜、沙二州 190 余年(1036—1227)间,曾改造、营造了一批佛教石窟。特别是由于西夏在瓜、沙二州的统治中心设在瓜州,因此在瓜州境内的榆林窟、东千佛洞营造了一批具有典型西夏特色的石窟。

相对于莫高窟的研究,学者们对榆林窟特别是对东千佛洞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目前仅能看到少量有关东千佛洞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关供养人研究的就更少。胡同庆新近发表的《安西东千佛洞研究编年述评》对有关东千佛洞的研究成果做了概要的介绍与评论^[1]。

笔者近年来在从事《敦煌石窟供养人研究》课题中颇留意于东千佛洞第2窟的供养人图像。该窟是具有典型西夏特色的洞窟,也是东千佛洞已编号的8个洞窟中保留有供养人图像的仅有的3个洞窟之一(另第4窟西壁龕内南、北壁和第5窟南、北壁下部也保留有供养人像)。于是笔者对以往有关东千佛洞第2窟的研究成果做了一番梳理,从中发现了一些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1983年,张伯元先生《东千佛洞调查简记》介绍了东千佛洞的情况,对编号的8个洞窟的塑像、壁画内容逐一记录,并附有2幅崖面洞窟位置图、10张洞窟照片和17幅洞窟平剖面图。这是迄今为止对东千佛洞最为详细的考古调查记录,为学者提供了基础资料。其中记录第2窟甬道的供养人图像:“甬道南壁上画垂幔;下画西夏供养人6身。现仅能看出头部,西起第一身为男供养人,绿地,榜题西夏文题记二行六字。其余已毁。甬道北壁上画垂幔;下画西夏供养人六身,现仅能看出头部,其余已毁。”^[2]张先生记录该窟有西夏供养人像12身,并提示该窟存有西夏文供养人题记。但不足的是仅判断南壁第一身为男供养人,南壁其余与北壁供养人身份未能判明。

1990年,张宝玺先生在《莫高窟周围中小石窟调查与研究》中,介绍了作者对莫高窟周围的南湖店、五个庙、下洞子、东千佛洞、早峡、碱泉子、昌马、大坝等中小石窟调查与研究的成果。其中论述西夏石窟时指出:“东千佛洞第2窟门侧西夏供养人服饰特征及西夏文题名,表明该窟是西夏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建功德而造。门侧左右壁各画六身供养人,虽漫漶,但仍可看出他们与建于西夏乾祐二十四年(1193)的榆林窟第29窟供养人的服饰是一致的,是典型的党项人

衣冠打扮。各供养人皆有墨书西夏文题名,唯右壁第3身2行14字,其中6字尚清楚,译成汉文为‘行愿者□□□□各检校(或助缘僧)□□□□’。”^[3]此处对东千佛洞第2窟供养人的论述有两点殊堪注意:其一,明确指出该窟供养人服饰与榆林窟第29窟供养人服饰是一致的,这启示我们注意两窟供养人服饰之间的关联性;其二,是第一次披露了该窟的西夏文供养人题记的汉文译文。遗憾的是,此处存在三个问题:其一,没有提供该窟西夏文供养人题记的照片和摹本,未能说明汉文译文的根据;其二,汉文译文本身存在模糊性,如在“各检校”之后又用括号注明“或助缘僧”,显示译文本身含糊不定;其三,没有对题记进一步进行考证研究。这提示我们在以后应该注意对该窟西夏文题记进一步进行准确深入的研究。

1994年,王惠民先生发表《安西东千佛洞内容总录》,以总录形式简要地记录了东千佛洞的位置、时代、形制和壁画、雕塑内容。其中记录第2窟甬道:“南壁上画垂幔,中画男供养人一排,存四身。北壁上画垂幔,中画男供养人六身。”^[4]王先生对第2窟的记录有两点颇堪注意:其一,张伯元、张宝玺二先生在前调查均记录该窟甬道南北壁各有6身共计12身供养人,王先生在后调查则记录该窟甬道供养人北壁6身、南壁存4身,是否南壁有2身供养人像因漫漶或其他原因后来已不见,值得存疑。其二,张伯元先生仅判断南壁第一身为男供养人,张宝玺先生则对供养人性别未作判断,王先生则明确判断该窟甬道南北壁供养人均均为男性。但笔者颇怀疑《安西东千佛洞内容总录》判断第2窟供养人均均为男性身份的结论不完全准确。因为按照我们考察敦煌石窟供养人像组合形式所见的惯例,一般都是男女供养人对称排列的。特别是在最有代表性的榆林窟西夏窟中,供养人像都是男女对称排列。如第2窟西壁甬道门北侧壁、南侧壁下部各有西夏男供养人像7身、女供养人像9身。第3窟甬道南、北壁各有上下两排供养人像,上排为西夏供养人像,北壁存男供养人像4身,南壁存女供养人像3身;下排为元代供养人像,也是男女对称排列,北壁存男供养人像5身,南壁存女供养人像5身。第29窟西壁门南、北侧分别为西夏男女2排供养人像,南侧壁上排南起依次为国师像1身、男供养人像4身、侍从3身,下排为男供养人像8身;北侧壁上排北起依次为禅定高僧像1身、女供养人像3身、侍从3身,下排为供养比丘尼1身、女供养人6身。由此可见,西夏供养人像是以男女对称排列为惯例。而《安西东千佛洞内容总录》著录第2窟甬道南北壁均为男供养人像,显然与此惯例不符。那么,是此窟的供养人像的排列出现例外形式,还是著录有误?另外,此窟供养人的身份是什么?尚未见学者予以论述说明。因此,如果能够探明东千佛洞第2窟的供养人像的身份,将有助于探明西夏石窟供养人像的排列规律,探明西夏石窟功德主的社会构成。

2006年8月中旬,笔者在瓜州县参加“瓜州历史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讨论会”时,有机会实地考察东千佛洞,得以对第2窟甬道供养人图像面壁进行仔细考察,征得瓜州县文管所同意,拍摄了该窟供养人图像资料,在此基础上参考学术界有关西夏佛教艺术与服饰研究的成果,运用图像学的方法,将该窟供养人图像与其他西夏供养人图像进行比较研究,并请求著名西夏学专家史金波、陈炳应二位先生帮助释读该窟供养人像西夏文题记。经过一番认真研究后,断定:东千佛洞第2窟甬道南壁4身男供养人是西夏时期瓜州地方男性武官,其中西起第3身供养人像依据其头侧西夏文题记可以确切知道具有“边检校”官衔,北壁则为6身女供养人,是与其相对的男性武官们的家眷。下文将对此予以申论。

二 东千佛洞第2窟甬道南北壁供养人像现状

东千佛洞第2窟甬道北壁可见6身供养人像,南壁可见4身供养人像。南、北壁似乎都被后代所刷浅浅一层白灰层覆盖过,导致供养人像身体下部残缺、漫漶比较严重(图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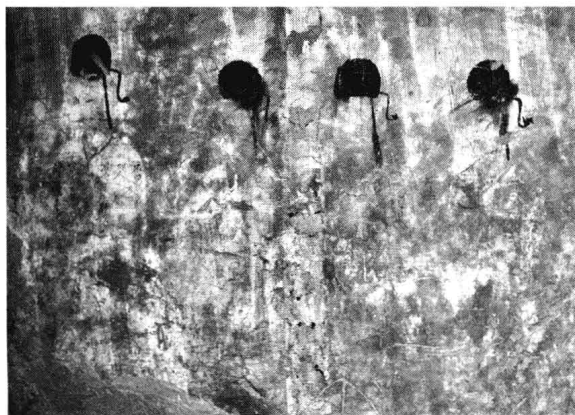


图1 东千佛洞第2窟甬道北壁供养人像 孙志军摄



图2 东千佛洞第2窟甬道南壁供养人像 孙志军摄

南壁供养人像有多处被后世游人题记所涂抹,其中有“明治四十四年”(1912)日本吉川小一郎的题记和2000年香港《文汇报》某宋姓“高级记者”的题记。南壁供养人像上层还被用白色线描4身僧人画像所覆盖。此线描僧人像是与西夏供养人像绘于同时呢?抑或是后世所绘而覆盖于其上呢?笔者认为当系后一种情况。理由有二:其一,此窟南北壁西夏供养人均系彩绘壁画,而南壁僧人图像则是白色线描画,显非同时所绘;其二,如上所述,敦煌石窟供养人图像大都呈有规律的对称排列,北壁只有彩绘俗家供养人像,而无线描僧人像,可证南壁当时也当只有彩绘俗家供养人像。笔者在实地仔细观察时判断,此白色线描僧人像似用现代白色粉笔一类工具所绘,更可证明非西夏时所绘。由于东千佛洞第2窟甬道南北壁存在上述种种被覆盖、涂抹的现象,造成供养人像残缺不全、漫漶不清,增加了辨认识读的难度。

三 东千佛洞第2窟甬道南北壁 供养人像、题记释读

虽然东千佛洞第2窟甬道南北壁供养人像身体下部残缺、漫漶比较严重,但其头冠部分却相对比较完整清晰,上身衣饰,特别是衣领部分也相对比较清晰,可以据此作出一些基本判断。

由于西夏服饰缺乏考古实物资料,只能依据敦煌石窟壁画和黑水城及其他地方遗址、墓葬中出土的数量有限的木板画、绢画中西夏人物的图像资料进行研究,以往学术界对西夏服饰的研究比较薄弱,对于许多基本问题都未能搞清楚。比如以往一些服饰史著作就曾将莫高窟

409窟东壁回鹘王像误判作西夏王像^[5]。近些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对西夏服饰的研究有了许多新的进展。利用目前学术界对西夏服饰研究已经取得的成果,可以帮助我们对东千佛洞第2窟供养人像作出比较判断。



图3 东千佛洞第2窟男供养人头冠、衣饰

编辑部翻拍

东千佛洞第2窟甬道南壁可见4身男供养人呈面西3/4侧立姿态,4人身高由西至东渐次降低以显示身份地位的差别,西起第1人身体最高,身份最尊,故立于供养人像列首位,手持长柄香炉(在敦煌石窟供养人像列居于首位或前列者往往手持长柄或无柄香炉)。南壁4身供养人像最值得注意的特征有三点:第一,均头戴尖圆形头冠,冠上有明显的贴金装饰;第二,均身着圆领窄袖紫色长衫,特别是西起第1、2身男供养人的衣饰比较清楚;第三,4身男供养人胯间左右两侧均各有一块腰袱,虽然图像漫漶,但仍可辨清腰袱四边与中间有紫色圆点状装饰(图3)。

据《宋史·夏国传上》记载,西夏显道二年(1033),李元昊建立西夏衣冠制度,规定:“文资则幘头、靴、笏、紫衣、绯衣;武职则冠金帖起云镂冠、银帖间金镂冠、黑漆冠,衣紫旋襴,金涂银束带,垂蹠蹠,佩解结锥、短刀、弓矢、鞬,马乘靛皮鞍,垂红纓,打跨钹拂。便服则紫皂地绣盘毯子旋襴,束带。民庶青绿,以别贵贱。”^①其中武官的头冠分为“金帖起云镂冠”、“银帖间金镂冠”、“黑漆冠”,很可能是根据官职高低而区分的。

安西榆林窟第29窟西壁门南侧有保存完整清晰的上下两排西夏男性武官供养人像,人像头部前侧均有西夏文题记。西夏学专家史金波、白滨二位先生曾对这些西夏文题记全部做过释读翻译^[6]。又据西夏学专家陈炳应先生对该窟供养人像题名的识读和解释,其中上排第二身为“沙州监军摄受赵麻玉”,“摄受”是代理兼任之意,此人为莫高、榆林二窟现存供养人像中职务较高的,故其前有“真义国师”导引;紧随其后的第三身为“□内宿御史司正统军使趣赵”,可能应译为“□内宿御史司正统军刺史”;第4身为“儿子御宿军讹玉”,是军士;下排第一身为“瓜州监军……”第二身为“施主长子瓜州监军司通判纳命赵祖玉”^[7]。可知均为西夏官衔不等的武官、军士。从这些供养人姓名来推断,他们当是属于同一个汉化的“赵”姓西夏家族。榆林窟第29窟西夏武官供养人具有比较明确的官衔,他们的衣冠服饰比较清晰,对于研究西夏武官服饰具有典型意义。但对于该窟男供养人所戴头冠,学者们的定名颇不一致。陈炳应先生认为是“起云镂冠”^{[7]51},段文杰先生认为是“金贴起云镂冠或银帖间金冠”^[8]、徐庄先生认为是“起云镂冠”^[9],谭蝉雪先生则认为是“金锦暖帽”^[10]。“金贴起云镂冠”、“银帖间金镂冠”、“暖帽”都是仅见载于传世史籍和西夏文文献中的西夏头冠名词,其形制并不十分清楚,故学者们会有不同的判断是很正常的。根据榆林窟第29窟西壁西夏武官供养人像仔细观察,虽然他们

①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的衣冠服饰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如均戴尖圆顶的头冠、冠后垂结绶至后腰部,身着圆领窄袖紫色长衫,这可能就是史籍所载的“紫旋襕”(图4;见图版39)。但与上述武官职衔等级不同相应,他们的衣冠服饰又可细分为二类。第一类是上排第二、三身,下排前三身供养人,其特征有三:一、头冠的前后左右侧都有附加的华贵繁缛的装饰件,这可能就是史籍所载的“起云镂冠”、“金镂冠”;二、腰束长带,可能就是史籍所载的“金涂银束带”;三、腰间有腰袱。腰袱是西夏武官常见的服饰,学者们对其称谓不一。沈从文先生与黄能馥、陈娟娟二先生均称“腰袱”^{[11-12][5] 295},段文杰与谭蝉雪二先生均称“护髀”,徐庄先生称“抱肚”(袍肚),当是学者们各自所据历史文献不同。笔者姑从沈从文先生与黄能馥、陈娟娟二先生“腰袱”之称。上述特征显示主人具有较高的地位。第二类是上排第三身和下排第四至第八身供养人,其特征是头冠没有第一类头冠的装饰件,比较简朴,腰间没有腰袱,也没有长腰带,显示主人地位较第一类供养人为低。



图4 榆林窟第29窟西壁男供养人像
孙志军摄

两相比较,东千佛洞第2窟甬道南壁男供养人衣冠服饰与榆林窟第29窟西壁门南侧西夏武官供养人颇有相似之处,如他们均头戴尖圆形金镂冠,身着圆领窄袖紫旋襕,腰间有腰袱,据此可以断定:东千佛洞第2窟甬道南壁男供养人也是西夏武官。但他们的头冠没有榆林窟第29窟西壁西夏武官头冠前后左右华贵的装饰件,显示他们的地位要比榆林窟第29窟西壁西夏武官为低。

按照敦煌石窟壁画的惯例,供养人像侧大多都有题记。张伯元《东千佛洞调查简记》记录第2窟甬道南壁有西夏文题记,张宝玺先生在《莫高窟周围中小石窟调查与研究》一文中还公布了该窟西夏文供养人题记的汉文译文,故笔者在现场实地考察此窟时特别留意供养人像题记。经仔细观察辨认发现,此窟甬道南北壁供养人像头部右侧都有榜题条痕迹,可惜由于被后世所刷白灰层覆盖,大多数供养人题记漫漶不清,已无法辨认字迹,只有在南壁西起第3身男供养人像头部西侧惊喜地发现一条比较清晰的榜题,从痕迹判断有2行西夏文,每行当有7字,虽榜题下部4字已漫漶难以辨识,但可喜的是榜题上部清晰可辨2行6字西夏文(图5)。

但笔者不识西夏文,为了求得准确释读翻译此西夏文题记,遂向陈炳应、史金波二位西夏学权威专家写信求助,承蒙二位先生帮助释读翻译此2行6字西夏文题记,并同意笔者公布他们的释读翻译结果。陈先生还寄来了根据照片摹写的西夏文题记(图6),并释读翻译为“行愿者”、“边检校”;史先生释读翻译为:“发愿者(也可译行愿者)”、“边检校”。二位专家的释读翻译结果不谋而合完全一致,“行愿者”是西夏供养人常用的称名,在敦煌石窟西夏文供养人题记中多见,如莫高窟第196窟甬道南壁刻划第三行:“行愿者高……”榆林窟第2窟后室门南侧第



图5 东千佛洞第2窟西夏文题记 孙志军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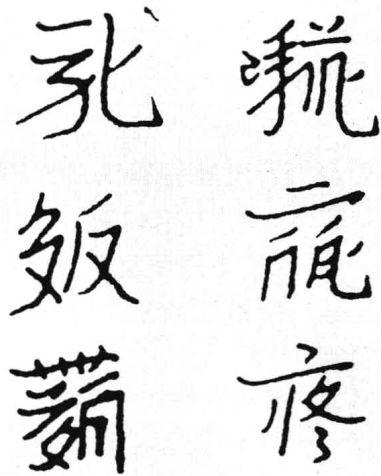


图6 西夏文题记摹本 编辑部翻拍

1、2 身女供养人题记：“行愿施主□氏□□则”、“行愿施主媳……”榆林窟第 29 窟西壁门北侧女供养人下层第 1 身题记：“行愿者翟万月成一心随愿”等。^{[7]8-13}“边检校”是西夏武官名。史先生指出：“边检校是西夏的中级武官，位于军溜盈能之上，副行统之下。”陈先生提示：“‘边检校’这个官职过去未发现，在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四中可以查到。”《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是西夏仁宗天盛年间颁行的一部法典，简称《天盛律令》，原文是西夏文，西夏学专家史金波、聂鸿音、白滨三位先生将其译为汉文。笔者查阅汉文本《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四共有七门 85 条，其中有多条涉及边检校，如“边地巡检门”第三条：

大小检人住地段上及退转失察，逃者□入敌界未觉者，与敌人、盗贼进入，畜、人、物未入手依人数承罪法比较，检主管、检人等减罪二等，及管事军溜盈能等，边检校、正副统等，各自依次减一等判断。^[13]

“敌军寇门”第一条：

沿边盗贼入寇者来，守检更口者知觉，来报堡城营垒军溜等时，州主、城守、通判、边检校、营垒主管、军溜、在上正、副溜等，当速告相邻城堡营垒军溜，及邻近家主、监军司等，当相聚。我方畜、人已入、未入他人之手，对敌军入寇者力能胜则当打败，力不堪胜，则视其军情，各家当转移，监视敌情。若不报告邻近城堡营垒军溜、家主、监军司等，已派报者而不往，传话中断，敌人、盗贼攻入，畜、人入他人手者，依攻入多少，边检校、营垒主管、州主、溜正等，及报告语中断者，与检主管失察及与城守、通判、副将佐等对检人失察等罪相同判断。其中已派遣报者，传话中断时，州主、城守、通判、边检校、营垒主管、将佐等勿治罪。^{[13]212}

根据《天盛律令》条文可知,西夏武官边检校的主要职责就是防守敌寇、盗贼入侵,保护边疆安全,同时从条文所反映的西夏武官职级序列可知,边检校位居州主、城守、通判、副行统、正统之下,营垒主管、军溜盈能、将佐之上,属于西夏中级武官。瓜、沙二州属于西夏的西部边境,故设有边检校之职。东千佛洞第2窟南壁西起第3身供养人依据西夏文题记可知其具有边检校官职,甬道南壁其他3身供养人的衣冠服饰与其基本相同,可以推断他们可能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官职。根据陈炳应先生研究,榆林窟第29窟西壁南侧上排第2、3身供养人分别为代理沙州监军、正统军刺史,下排第2身供养人为瓜州监军司通判纳命,其职位均在边检校之上。这也印证了上文依据东千佛洞第2窟与榆林窟第29窟男供养人衣冠服饰比较而对其地位高低所作的判断。

上文已经探明东千佛洞第2窟甬道南壁男供养人的身份,下面再来考察该窟北壁的供养人。北壁可见6身供养人像,与南壁的男供养人一样呈面西3/4侧立姿态,6人中西起第一人身最高,显示其地位最尊,其余5人身高无明显差别。北壁6身供养人图像最值得注意的特征有二点:第一,均头戴高耸的桃形金冠,冠上有明显的贴金装饰,冠后侧可见花钗伸出,鬓边有冠缨下垂至脸颊;第二,6身供养人的衣饰虽然漫漶,但第1身明显可见身着交领右衽窄袖长袍(图7)。榆林窟第29窟西壁北侧有上下2排女供养人像,下排三身有西夏文题记:“女金宝一心归依”、“媳妇赖氏□□一心归依”,可知她们是相对的西壁南侧男性武官供养人的夫人、女儿、儿媳等女性家眷。她们的衣冠服饰具有两个共同特征:第一,均头戴高耸的四瓣桃形金冠,冠侧系一饰带至鬓脚,冠后侧可见花钗伸出;第二,均身着交领右衽窄袖开衩长袍(见图版51)。



图7 东千佛洞第2窟北壁女供养人头冠衣饰
孙志军摄



图8 绢画《阿弥陀佛接引图》中女供养人像
编辑部翻拍



图9 绢画《观音菩萨》中的女供养人像
编辑部翻拍

这种桃形花钗冠和交领右衽窄袖开衩长袍当为西夏贵族女子惯用的衣冠服饰。我们在黑水城出土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绢画中也可看到多个相同的例证。如俄藏 X-2416 号绢画《阿弥陀佛》中的女供养人(图 8)^①、X-2435 号绢画《观音菩萨》中的女供养人(图 9)^②, 都是同样的衣冠服饰。元人马祖常《河西歌》云:“贺兰山下河西地, 女郎十八梳高髻。”^[14] 西夏妇女喜欢梳高髻, 贵族妇女则在高髻上加戴高耸的桃形花钗冠, 这从上述的图像中都可以清晰地看到。

尽管东千佛洞第 2 窟甬道北壁供养人图像有些漫漶, 但从其衣饰特别是保留完整的头冠来看, 显然与榆林窟第 29 窟西壁北侧女供养人、俄藏黑水城出土绢画中西夏女供养人服饰相同。图 7 所见东千佛洞第 2 窟甬道北壁西起第 1 身供养人与图 8 所见俄藏 X-2416 号绢画《阿弥陀佛》中的女供养人头冠后侧伸出的花钗、下垂至鬓脚的冠缨尤其相似。由此完全可以断定: 东千佛洞第 2 窟甬道北壁当为女供养人, 她们是相对的甬道北壁的男性武官供养人的女性家眷。该窟甬道南北壁男女供养人相对, 这与敦煌石窟相对壁面大多为男女供养人像对称排列的规律是完全吻合的。

四 结 语

以上笔者借助学术界对西夏服饰研究的成果, 运用图像学的方法, 通过仔细的比对辨析, 得出新的结论: 以往学者指出东千佛洞第 2 窟甬道南壁为男供养人是正确的, 但认为北壁也是男供养人则是错误的, 北壁其实是女性供养人。南壁供养人是西夏时期瓜州地方的男性武官, 北壁供养人则是其女性家眷。

西夏时期地广兵众, 曾设立十二监军司, 在瓜、沙二州也设有监军司, 在当地有一批握有实权的军政官员。西夏朝野普遍信仰佛教, 《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铭》记载西夏佛教之盛云: “释教尤所崇奉, 近自畿甸, 远及荒要, 山村溪谷, 村落坊聚, 佛宇遗址, 只椽片瓦, 但仿佛有存

^① Mikhail Piotrovsky, “The State Hermitage Museum, Lost Empire of The Silk Road: Buddhist Art from Khara Khoto(X - XIII the century)”, by Electa, Milano Elemond Editori Associati And by Fondazione Thyssen - Bornemisza, 1993, pp180.

^② Mikhail Piotrovsky, “The State Hermitage Museum, Lost Empire of The Silk Road: Buddhist Art from Khara Khoto(X - XIII the century)”, by Electa, Milano Elemond Editori Associati And by Fondazione Thyssen - Bornemisza, 1993, pp207.

者,无不必葺,况名迹显敞古今不泯者乎?”^①作为佛教圣迹的瓜沙石窟更是受到西夏统治者的格外重视,握有军政大权、具有经济实力的瓜沙地方官员十分热衷于营窟造像这样大规模的佛教功德活动,榆林窟第29窟就是“沙州监军摄受”赵麻玉、“瓜州监军司通判纳命”赵祖玉等人作为施主修建的功德窟。在东千佛洞现存洞窟中规模较大、内容颇丰的第2窟也是具有边检校官职的瓜州地方中级武官及其家人作为施主共同出资建造的功德窟。这为我们研究瓜州的石窟营造史、佛教史增添了新的资料。

附记:在本文撰稿过程中,笔者承蒙著名西夏学专家史金波、陈炳应二位先生帮助释读翻译西夏文供养人题记,并予以指教。二位先生奖掖后进、襄助学术的责任感与热情,令后学感佩难忘,谨志此以示衷心的感谢!

参考文献:

- [1] 胡同庆. 安西东千佛洞研究编年述评[J]. 敦煌研究, 2006(5): 51-55.
- [2] 张伯元. 东千佛洞调查简记[J]. 敦煌研究, 1983(创刊号): 111.
- [3] 张宝玺. 莫高窟周围中小石窟调查与研究[C]//段文杰,等,编. 1990 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考古编. 沈阳: 辽宁美术出版社, 1995: 89-104.
- [4] 王惠民. 安西东千佛洞内容总录[J]. 敦煌研究, 1994(1): 126-129.
- [5] 黄能馥, 陈娟娟. 中华历代服饰艺术源流[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 296.
- [6] 史金波, 白滨. 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研究[J]. 考古学报, 1982(3): 367-386.
- [7] 陈炳应. 西夏文物研究[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5: 12, 22.
- [8] 段文杰. 榆林窟的壁画艺术[M]//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7: 174.
- [9] 徐庄. 敦煌壁画与西夏服饰[J]. 敦煌研究, 2005(特刊): 79.
- [10] 谭蝉雪. 敦煌服饰画卷[M]//敦煌石窟全集: 第24卷. 香港: 商务印书馆, 2005: 214.
- [11] 沈从文.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7: 407-408.
- [12] 黄能馥, 陈娟娟. 中国服装史[M].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1995: 242-243.
- [13]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M]. 史金波, 聂鸿音, 白滨, 译注.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0: 201.
- [14] 赵翼. 陔余丛考: 卷42·妻肉僧条[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57.

(原载《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4期)

^① 《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 见《北京图书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 第151—159页。

榆林窟第6窟蒙古族供养人坐具

董晓荣 齐玉华

一 引 言

蒙古攻克西夏后,沙州之地首先成为术赤之子拔都的封地,忽必烈即汗位后不久,在西夏故地设立行省,开始将河西纳入中原王朝的直接控制之下,“至元十四年(1277),复立州。十七年(1280),升为沙州路总管府”^[1]。

察合台汗国的阿鲁浑汗之子出伯、合班兄弟为首的一批察合台系诸王及其部民投奔忽必烈,被安置在哈密、沙州、瓜州、罗布泊一带,并最终以此为封地,形成了自己的兀鲁思(小汗国)^[2]。“大德八年(1304),辛丑,封诸王出伯为威武西宁王,赐金印”^[3]。从此出伯及出伯家族以诸王身份出任河西地区的军事统帅重任,直至1372年明朝大将冯胜西征,敦煌归属明朝^[4]。也就是说沙州地区被出伯家族统治了一个世纪之久。敦煌石窟中保存有此时期修建的洞窟或重修前代洞窟,保留了一部分元代所绘的壁画内容,部分是元代蒙古族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其中绘有蒙古族贵族供养人的坐具,这对元代坐具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到目前为止,一些学者对元代家具进行了许多研究,但很多问题尚待更深入地进行探讨。元代家具继承了唐宋风格还是辽金风格,是否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等问题上有许多争论,而且元朝帝国南方地区与北方地区的家具风格也有差异,南方以文雅“宋风”家具占主导地位,北方主要是蒙古族统治者使用的“西北风格”的家具占主导地位。本文主要探讨元代北方地区蒙古族统治者使用的坐具为重点,试图说明榆林窟第6窟明窗前室西壁北侧和南侧所绘蒙古族供养人坐具与元代设在各斡耳朵(宫帐)中的“宝座”之关系,并进一步说明其坐具的源流及其特点。

二 榆林窟第6窟蒙古族供养人坐具与蒙元时期“宝座”之关系

榆林窟现存元代开凿的洞窟有第4、27等窟,元代重修的洞窟有第2、3、6、10、15、18、

29、39、41等窟^[4]。榆林窟第6窟是唐代开凿，五代、宋、西、夏、元、清、民国初重修的穹隆顶大佛窟，甬道有清修阶道上达崖面；西壁上部开券顶明窗外接平顶前室，前室有券顶甬道通崖面^[4]。此窟明窗前室西壁北侧和南侧绘有蒙古族男女供养人像，他们盘腿坐于一张极低、无腿的长方形坐具上（见图版15；图1）。此坐具有栏杆式高靠背，坐具后部高靠背两侧有向前延伸的侧围栏，后栏杆式高靠背较高，两侧栏杆较低。高靠背上部呈半椭圆形，椭弧部以连续的小弧纹构成。靠背两端伸出部位向上翻卷，呈灵芝纹（云纹，如意纹）似的翘头。坐具座面前沿绘有连续的回纹和小佛。此坐具的形制与蒙元时期设在各斡耳朵（宫帐）中的宝座很相似。

13世纪中叶法国旅行家鲁布鲁克到拔都汗的斡耳朵（宫帐）时看到：“他正坐在宝座上，宝座长而宽，好像一张床，全部涂以金色，并较地面为高……”^[5]同时期到过蒙古地区的另外一名意大利旅行家柏朗嘉宾描述贵由汗的斡耳朵（宫帐）：“人们在这里还用木板搭了一个高台，台上安排有皇帝的宝座，宝座是用象牙制作而成的，雕刻得令人仰目。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还有金子、宝石和珍珠。”^[6]他到拔都的斡耳朵（宫帐）时目睹到：“他坐在高高的如同宝座一样的位置上，由他的一位王妃陪同；其他人，包括他的兄弟或者他的儿子及其他品级较低微者都坐得较低，即幕帐中间的一条长凳子上；其他人都在他们后面席地而坐……”^{[6]95}

从上述外国旅行家目睹的情况来看，蒙元时期各大汗斡耳朵（宫帐）中已有了多种坐具之类的家具，其中宝座最引人注目，雕饰得十分华丽，也有用象牙、金、宝石等贵重材料装饰的。元朝建立后拥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匠队伍，蒙古大军西征后，中亚各族工匠、青年、妇女、学者、技工等跟随成吉思汗从中亚来到中国，聚集在西北地区和北方地区^[7]。《元史》卷122载：“太宗时期，仍命阿儿浑军，并回回人匠三千户驻于荨麻林。”^[8]《元史》卷17载：“（至元三十年）上都工匠二千九百九十户。”^[9]所以元庭设立专门的机构来管理各行工匠。《元史》卷90载：“犀象牙局，秩从六品。大使，副使，直长各一员，司吏一人。掌两都宫殿营缮犀象龙床卓器系腰等事。”^[10]“牙局，提领一员，管勾一员。掌宫殿象牙龙床之工”^{[10]2281}。此“宝座”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长而宽，像一张床，大汗与正妃子同坐于宝座之上，其他妃子与大臣都不能享用此坐具，说明此坐具也是一种地位的象征。又一位西方旅行家鄂多立克看到：“当大汗登上宝座时，皇后坐在他的左手；矮一级坐着他的两个妃子；而在阶级的最低层，立着他的宫室中的所有其他妇女。”^[11]这足以说明宝座很宽大，蒙古族习于盘腿坐，供两个人盘腿而坐的坐具一定很宽大。从榆林窟第6窟壁画中看到，蒙古族男女供养人盘腿坐于一张像床一样的坐具之上，两人之间也有一定的距离，看似此坐具的体积很大，与旅行家看到的“宝座”形制颇相似，只是没有繁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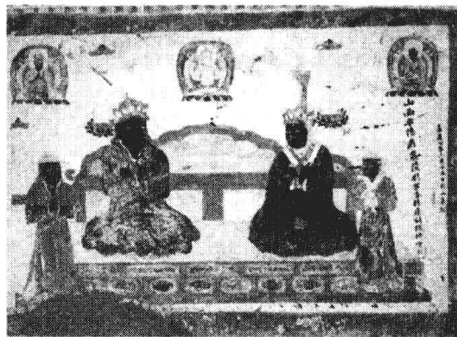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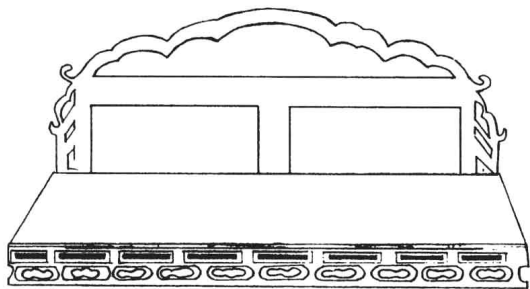


图1 榆林窟第6窟明窗前室西壁南侧

华丽的雕饰而已。

宋人赵珙《蒙鞑备录·军装器械》载：“成吉思之仪卫，建大纯白旗以为识认。外此并无他旌幢，惟伞亦用红黄为之。所坐乃金裹龙头胡床。”^[12]这里所说的“金裹龙头胡床”就是蒙元时期设在各斡耳朵(宫帐)中的“宝座”^[13]。说明当时南北家具风格不同，南人称北方蒙古族统治者宫帐中的坐具为“胡床”。《元史》卷144《福寿传》载：“(至正)十五年，(福寿)迁江南行台御史大夫……十六年三月，大明兵围集庆，福寿数督兵出战，尽闲诸城门，独开东门以通出入，而城中势不复能支，城遂破。百司皆崩溃，福寿乃独据胡床坐凤凰台下指麾左右。”^[14]作为江南行台御史大夫的福寿所坐的坐具也被称为“胡床”，这里所说的“胡床”也许就是元代诸王显贵宫帐中的“宝座”的一类，南人把此坐具也称为“胡床”。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详细描述了忽必烈在中原建立的宫殿内摆设的家具，说大明殿中设“七宝云龙御榻，白盖金缕褥并设后位，诸王百僚怯薛官侍宴坐床，重列左右”，宝云殿设“寝殿楠木御榻，东夹紫檀御榻”，隆福殿中设“正殿缕金龙樟木御榻，从臣坐重列前两旁。寝殿亦设御榻，褥褥咸备”^[15]。这里描述的“御榻”，即“宝座”。看来当时的“御榻”既是坐具又是卧具。设在正殿中的是坐具，设在寝殿中的是卧具，形制相同。“御榻”上备有金缕褥，并设有后位，此坐具体块雄厚，这与壁画中供养人坐具的形制相似。因为上述坐具是皇帝宫殿中的“御榻”，所以装饰讲究，雕刻细密，雕有七宝云龙纹，诸王显贵则不能雕有龙纹，所以雕有蒙古族最偏爱的灵芝纹(云纹、如意纹)者多见。皇帝“御榻”用料昂贵，有紫檀、樟木、楠木等。

熊梦祥《析津志·家具之属》载：“(元大都的家具有)铁络、量罐、椀架、马槽、大小木柜、镗槃、盘、榭、矮卓、矮床、门匡、窗隔……”^[16]这里所提到的“矮床”很可能是帐中摆设的坐具或卧具，形制是低矮的。从而得知，作为皇帝坐具或卧具的七宝云龙御榻、缕金龙樟木御榻、楠木御榻等的形制也是低矮的。

元代不仅宫中设有“御榻”、“宝座”，御用的车上也设“宝座”。《元史》卷78载：“腰舆。制以香木。后背作山字牙，嵌七宝妆云龙屏风，上施金圈焰明珠，两旁引手。屏风下施雕镂云龙床。坐前有踏床，可贴锦褥一。”^[17]从形制上看此“腰舆”后有屏风，两旁有引手，前有踏床，上铺有锦褥，也与“宝座”的形制相似。此“腰舆”装饰也非常华丽，这也是元代社会喜奢侈，尚富丽的体现。

皇帝宫殿中“宝座”的最突出的特点是用料昂贵，雕刻精细，镶各种金银宝石，显得金碧辉煌、气派非凡。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釉里赭花卉纹宝座高24.1cm、长29.3cm、宽15.3cm，属景德镇窑(图2)。座面呈长方形；后背为三扇屏风，左右各一扇，共计五扇屏风；四足为云头转珠纹，宝座整体满饰花卉蔓草纹，给人的感觉是造型饱满，形体重厚，雕饰繁复，雄壮奔放。此宝座是典型的元代宫廷坐具^[18]。那么其他诸王显贵斡耳朵中(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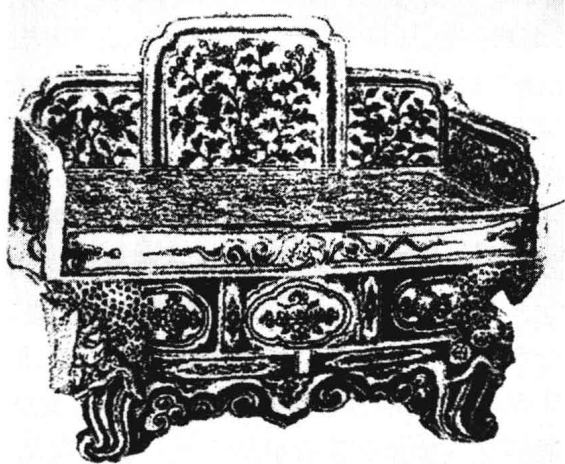


图2 元代釉里赭花卉纹宝座 编辑部翻拍

帐)的“宝座”是什么样的呢?西方人所绘《旭烈兀汗在沙弗尔罕》一图中(图3)^①,旭烈兀汗与正妃子同坐于“宝座”之上,“宝座”有高靠背和侧围板,座面呈长方形,没有腿,较地面为高,座上铺有带花纹的坐褥,座前放着一个踏脚板。“宝座”的靠背和围板上雕饰的花纹不太清楚,只能看见座面前沿绘有花纹。拉施特《史集》抄本插图中多处绘有蒙元时期各大汗斡耳朵(宫帐)中的宝座(图4—6)^②,其形制大致相同,多三面围栏式,后栏较高,两个侧栏杆较低,后靠背以上下两部分组成。



图3 旭烈兀汗与妃子



图4 斡耳朵中的宝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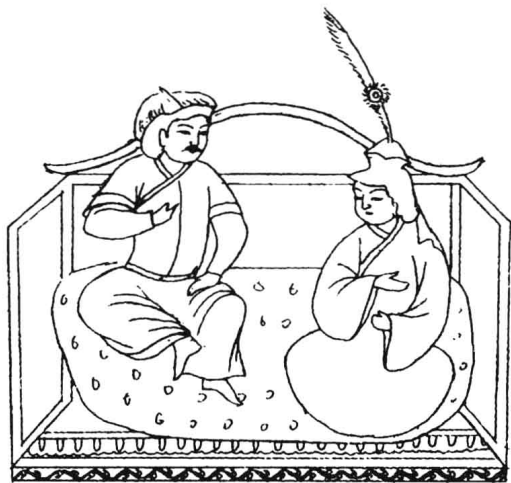


图5 斡耳朵中的宝座



图6 斡耳朵中的宝座

① 此图选自志弗尼著《世界征服者史》中的图版。

② 此图选自史卫民著《元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法]德阿托隆著《蒙古人远征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中的图版。

不同处在于栏杆式围板,有的靠背上部分表现的曲线不同。看来皇帝宫殿中的“宝座”与各大汗、诸王显贵斡耳朵(宫帐)中的“宝座”形制相似,只是质地、雕刻技艺等方面有差异。元代蒙古族质孙服也有此种情况,宴会时上自百官,下至乐工、仪卫,都穿同样颜色的质孙服,只能从质孙服的质地、佩饰、花纹等方面区别他们的身份与地位。

《异域志》中记载鞑靼风俗时说:“其风俗以鞍马为家,水饮草宿,无城郭房屋。”^[19]蒙古族从室韦时期始逐水草而迁徙,帐中家具非常简便,以耐用、低矮的家具为主,蒙古族入驻中原后建立都城,一部分统治者开始定居生活,从此家具的种类丰富起来了。贵族和富裕之家帐中有床,贫苦牧民则只能在地上铺毡而睡^[13]。为此,坐具也能成为分辨拥有者身份的标志。从上述文献中得知,皇帝御榻的形制是低矮的,图片中看到的旭烈兀汗与其他诸汗斡耳朵(宫帐)中宝座的形制也以低矮为主。从而推测出,皇帝的宝座与诸汗诸王显贵宝座的形制相似,只是质地与雕饰不同而已。从形制来看,敦煌榆林窟第6窟蒙古族供养人所坐的坐具很可能是蒙元时期设在各诸王、显贵斡耳朵(宫帐)中的宝座的一种。

三 榆林窟第6窟蒙古族供养人坐具的源流及其特点

汉代、三国时期家具的类型发展到床、榻、几案、屏风、橱、箱和衣架等。出于席地而坐的习俗,睡眠的床、榻在形制上较矮。到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由于佛教的影响和民族的融合,家具发生了显著变化,虽然那时普遍的仍是席地而坐的生活方式,但床榻的尺度有了加高,床上有帐架^[20]。到两宋时期,家具因受到宋代文人文化的直接影响,呈现出一种与唐代宏博华丽的风格不同的结构简洁工整、装饰文雅隽秀的风格。宋代箱形结构床榻、带屏床榻、四足平板榻等大多方方正正,比例优美,多数以直线部件榫卯而成,而这些直线部件都是按照严谨尺度刻意推敲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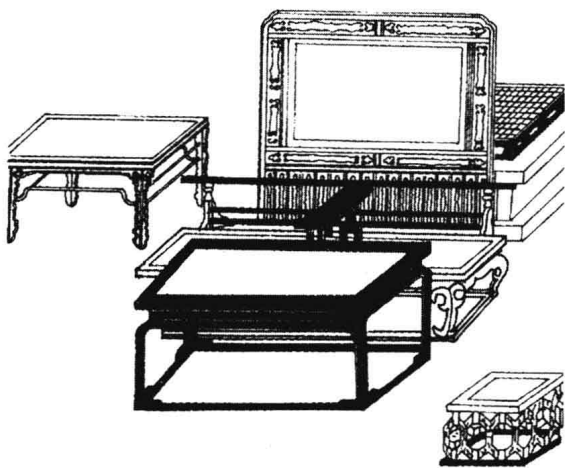


图7 宋代《梧荫清暇图》中床榻

来的,以唐代床榻相比足有所增高^{[18]156-157}(图7)^①。到元代,家具风格与宋代相比风格迥异,元代统治者尚武,追求豪华,崇尚游牧文化中豪放无羁、雄壮华美的审美趣味。所以元代家具造型上厚重而粗大、装饰上繁复而华美^{[18]159}。此种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元代“宝座”体形硕大,雕饰繁缛华丽,多有三面式围栏,座面更趋低矮。五代以前的榻,大多无围,只有供睡觉的床才多带围子。两宋时期的床榻大体还保留着唐、五代的遗风,大多无围子^[21]。元代宝座的三面式围栏形制与辽金的床榻颇相似。辽与北宋、金与南宋,同处一个时代,然而辽、金的家具却比中原地

① 此图选自胡德生《中国古代家具》中的插图,上海文化出版社,1997。